

王禎農書



王禎農書

王毓瑚校

農業出版社

王 楨 农 书

王 毓 瑚 校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332 千字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统一书号 16144·1920 定价 3.20 元

校 例

一、文字以庫本爲主，用嘉靖本（簡稱明本）校補，並參攷其他版本，特別是武英殿聚珍本。

一、庫本原文盡可能不動。校記中一般只舉庫本和明本二者之間的歧異，遇必要時才提到其他版本。庫本和明本字句互異，其庫本有誤者予以改正，並在校記中注明。但字雖互異，而含義並無不同，或不能判斷是非者，校記中只舉出異文。字雖不同，但或者原可通用，或者其一爲異體，總之是無傷於文義者，一般不予指出。

一、有的地方，庫本和明本都有脫誤，而其他版本又都沒有訂正者，爲了使文義明顯，校者大膽地做了一些校補。凡是這種地方，在校記中都有詳細的說明；除將有關各本的原文完全錄出以備讀者比較審斷外，凡是補入的字，都用方括號標出，以示區別。而這樣的處理仍然限制在盡可能少的幾個地方。

一、庫本原校訂者所加的案語，非原書所有，一概刪去。但刪掉的文字，往往有一定的參攷價值，所以仍然保留在校記裏面。

一、書中引用前人著作，其係照錄原文者，都加引號；其字句有改動者，無論改動大小，一概不加引號。

一、有的地方引文與原書相違，但顯然並非有意改過，而只是出於偶誤者，仍據原書予以改正，但在校

記中都做說明。

一、書中徵引前人的議論或解釋，雖然標舉書名，但常常是割裂原文，或者改動了辭句；也有時把幾種書的文字揉合在一起，而前面只舉一個書名的；更往往錯標了書名，張冠李戴。所有以上情況，都一一查明，在校記中交代清楚；必要時舉出原書的有關字句，以備核對。至於本書原文，則仍舊不予改動，以示謹慎。

一、書中插圖以明本爲主。在有的圖後面也寫了校記；與庫本出入較大的，還載入了庫本的插圖，以便比較。有幾幅圖明本原闕，就用庫本的來替補。聚珍本插圖與明本、庫本都大不同者，也一併載入。

校者說明

一九五五年，從事祖國農學遺產整理研究工作的同志們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籌備組的領導下集會商討工作，當時就把整理王禎農書的任務分配給我。由於種種原因，工作進行得非常之慢，而且是時斷時續；原來是想要在一九六三年能够刊出，用來紀念本書著成的第六百五十周年的，但到時工作未能完成，又一直延遲到今天，算起來已然拖了十年了。

在我國古代農學著述當中，本書算是篇幅比較大而價值也比較高的一種。全書十三萬餘言，插圖二百八十餘幅，除了估計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兩節以外，仍然保存完整。關於這部農書以及書的作者在我國傳統農學上的貢獻，近幾年來不斷有人著文評論，因此就不準備在這裏再做詳細的介紹。只想簡單地指出，作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礎上可以說是第一次對所謂廣義的農業的生產知識作了較全面的、系統的論述，提出來一個中國傳統的農學的體系。他是個北方（山東）人，多年生活在南方（江南），所以他的著作裏面總是時時顧及南北的差別，致意於其相互間的傳習交流；書中反映了很多當代農業生產上的真實情況，都是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還必須指出，作者當然是一個農學家，但他首先還是一個出色的工藝學家。他憑了這方面的才能，對當時農業上所用的一切器物分門別類地作了詳盡的記述，並且一一附上圖樣，這尤其是一種突出的貢獻，值得我們特別珍視。

這部書也同其他許多古代的農書一樣，由於歷來的傳本都有很多的訛誤之處，各種本子相互之間也存在着不小的出入，爲了盡可能恢復它的原貌，需要進行一番校訂工作。本書的文字大體上平順易讀。書中所引用的前人的著作，絕大部分都還在流傳，易於覈對，其中比較重要的幾種最近又都經過了整理注釋；特別是農桑通訣和百穀譜兩個部分，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幾部農書改寫的。因此本書的整理就不須對各別字句詳細詮釋，而是可以僅限於標點以及文字和插圖的校訂。下面要說明的就是關於本書的校訂方面的一些問題，以及這個校訂本的特點。

一、本書歷來的各種傳本

本書作者的自序題的是「皇慶癸丑」，那是公元一三二三年，書大約就是那一年全部完成的。全書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據戴表元的序文，作者當時給他看的只是農桑通訣和農器圖譜兩個部分。本書末後提到了江西命工刊板，那應當是與戴氏寫序大約同時。因而可以推想，當時刊行的應當也只是那兩個部分。戴表元可能就是爲了那次付刊寫了那篇序。穀譜是後來才續作的。不過在江西付刻，當時是否確實實現，還是疑問。康熙廣永豐縣志賢牧傳裏面曾說到作者「著有農書，刻於廬陵」，大約是因襲的舊志，也不知道原來是什麼根據。無論如何，明代以及清代中期以前公私書目都沒有著錄本書的元刻本。後來莫友芝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列舉本書的各種版本，其中有「元刊本」。不過既然是從來沒有經人提到過，這就恐怕未必是他所「見」，而只是所「知」；而其來由也許就是本書最後作者所說過的那一句話。後來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大約就是又因襲了莫氏的著錄。關於這個校本後面收入

「附錄」的那一篇可疑的元朝皇帝刻行本書的詔書，留到後面再談。以上說的是江西的不完全的刻本。至於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的全書，更沒有在元代曾經刻行的記載。試一玩味作者的自序，字數寥寥，語調低沉，不大像是準備付印前的語氣，倒是流露出來一個學者寫出了嘔心之作而無法傳諸其人的鬱悶心情。序裏面沒有再提到江西的事，也暗示那次付刻並沒有結果。古代刻書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本書不但篇幅較大，而且附有很多的插圖，刻起來尤其不易。根據各種資料來推測，作者是個比較清廉的官，如果沒有大力者的資助，自己刻行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至少是沒有關於作者生前刻行的確實記載。早期流傳的好像只是傳抄本。

邵懿辰標注還說本書有明初刊本，不知所據。可以肯定的只是在永樂年間，也就是本書寫成的一個世紀以後，被收入了明代皇家所編纂的永樂大典。又過了一百多年，到了嘉靖九年（公元一五三〇年），山東布政使司根據一個抄本刻印，這也許就是本書的最早刻本。至於所據的底本是一個元抄本，還是明抄本，那就無從得知。後來在萬曆二年（一五七四年）山東濟南府章丘縣縣署又翻刻了一次，書的行款完全依照原刻，只是刻工較差。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鄧漢又據嘉靖本重刻了一次，行款有了改變，插圖也略有刪減。過去大家談到這個刻本，都以爲是個節本；最近承胡道靜同志指教，才把問題弄清楚，原來誤會是從莫友芝那裏來的。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裏面關於本書有「明萬曆末鄧溪（漢）刊本刪併爲十卷」的話。其實他當年所見的是一個只存十卷的殘本，收藏在豐順丁氏的持靜齋，而查持靜齋藏書紀要，本書下面確記的是「十卷」，但下面還明明注有「不足」二字，意思是書有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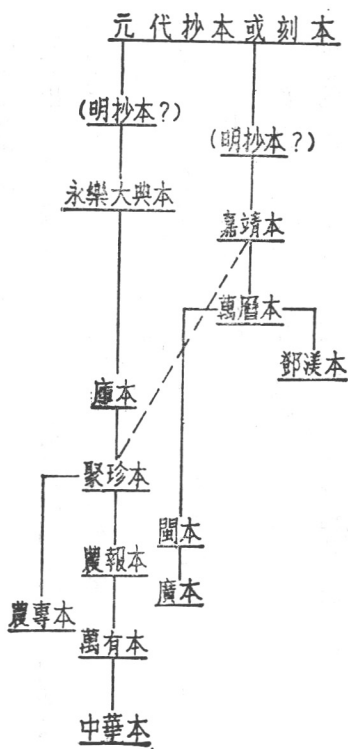
缺，莫氏著錄時偶爾忽略，掉下了這兩個字，後來的人就都跟着錯了下來。不過葉德輝書林清話「明人刻書之精品」條明白提到了「鄧漢文遠堂萬曆丁巳（四十五年）……刻王楨農書三十六卷」，見天祿琳琅後編十六」。這個刻本比較稀見，解放前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部，已被劫去台灣，再就是據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說，日本的內閣文庫和東洋文庫各有一部，刻工是比較差的。合算起來，本書在明代刻過三次，而這三種刻本又是同一個來源。

清代中期以前，本書好像是流傳不多。到了乾隆年間，皇家編纂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裏面錄出了不少的古書，本書也在其內，這就是所謂庫本。這個本子與明刻本却大不相同，不但多了一篇作者的自序，而且書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序次也不一樣，內容也稍稍有些出入。後來官方用活字印了一部武英殿聚珍板叢書，其中也有本書，這也就是本書在清代的第一次印本。這個本子雖說是根據的庫本，但有不少地方看得出來是參攷了明刻本改訂過的，甚至還有與明本和庫本都不相同的地方。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是後來流布很廣的幾種版本的祖本，因此特別值得注意。

清代晚期，也就是十九世紀的末葉，在全國上下提倡「實學」的潮流中，先是於一八九五年福建刻行的武英殿聚珍板叢書中增入了本書。顯然是因為他們無法看到庫本，於是就用了嘉靖刻本作為底本。（鄭振鐸書林漫步以為根據的是萬曆刻本，當是偶誤。）但於卷首又依例安上了四庫全書總目的本書提要，以及乾隆皇帝的題詩，因而顯得有些不倫不類，因為提要本來是對明刻本大加指斥了的。這個本子的校訂者雖然自稱進行了詳細的覈對，錯誤還是非常之多。不過將近三個世紀不曾重刊過的

明刻本因此又得比較廣泛地流傳起來，也還是件好事。四年之後，廣東的廣雅書局把這個本子又翻刻了一次。而且這次翻刻的前一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在上海的農學報社又根據聚珍板本出版了一個石印本，在更爲廣泛的讀者之中傳布了這部農書。辛亥革命以後，山東農業專科學校於一九二四年出了一個排印本，也是以聚珍本或農報本爲底本，經過了比較周密的校勘。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又印行了一個新的排印本，編入萬有文庫，所根據的顯然也是聚珍本或農報本。解放後，一九五六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鉛印本，仍然是用的萬有文庫本的原來紙型，不過稍有修改而已。

以上是關於本書歷來各種傳本的簡單介紹。其間遞嬗的關係可以列成一個表：



二、兩個系統的本子的異同

從上面的表可以看出來，本書歷來的各種傳本分屬於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嘉靖本為祖本，可以簡稱為明本系統；另一個的根源是出自永樂大典的庫本。這兩種本子頗有不同之處，除了個別地方是屬於脫誤性質或者有意的修改而外，主要的差別是：

一、明本系統的各本沒有作者的自序，但有閩閱的序，庫本系統的則恰恰相反。

二、明本全書分為三十六集，庫本則分為二十二卷。

三、書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在明本叫作「穀譜」，庫本則名為「百穀譜」。

四、三個組成部分的序次，明本是「農器」部分上接通訣，穀譜殿後，庫本則百穀譜在農器譜之前。

五、明本三個組成部分的前面都有目次，庫本沒有。

六、明本通訣之「三事起本」附有插圖五幅，穀譜前面有插圖二幅，後者並有說明文字，庫本都沒有。

七、明本通訣部分授時篇前有一幅授時圖，地利篇前有一幅地圖；在庫本裏面，前者註明刪去，後者根本沒有。

八、兩種本子的農器部分的一些插圖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其所以有這些差別，也許是原來永樂大典本和嘉靖本所根據的底本原是各不相同。前面說過，作

者寫成通訣和農器譜之後，就有江西刻行之說。可知作者自己當時也視爲定稿，刻本也好，稿本也好，當時大約已經稍稍流傳。後來又寫出穀譜，無論曾否付刻，有的已經有了前兩個部分抄本的人，有可能又把後來的這一部分拼到了後面，並且就這樣流傳起來。嘉靖本的底本，大約就是這樣的一個傳抄本。而在這之外，作者寫出穀譜之後，極可能是曾重新訂定全書，把這一部分安排在農器譜之前，還寫了一篇短序。這個稿本或曾付刻，或經傳抄，而被收入永樂大典之中。傳本的分歧就是這樣子造成的。再有一種可能是，早期的傳本並沒有兩樣，而是明代早期傳抄的人，尤其是嘉靖本的校訂者有意地做了改動。這樣猜想的根據是，明代，特別是從中葉起，一般文人隨意篡改前人著作的風氣逐漸形成起來，對於流傳不廣，尤其是從未刻行過的文籍，往往多方修改，藉以欺世盜名。正是由於這樣的攷慮，嘉靖本不能叫人十分相信。當然在另一方面，庫本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首先應當指出，當年四庫全書的校訂者們是奉了旨意對各書進行纂改的。具體到本書，內容字句也是有過改動的。不過本書究竟是一部專講生產知識的著作，與清代統治者所關心的政治問題沒有什麼牽涉，所以改動的幅度極可能是有限的。那些經過改動的地方，一般都有校訂者的案語做了交代，因此可以相信，這個本子基本上保存了永樂大典本的面目，從而也就是比起嘉靖本來更接近於本書的原樣。庫本的可以肯定的錯誤是在改動分卷上面。關於這一點，有詳加說明的必要。

三、集目和分卷問題

據作者的自序，本書「爲集三十有七」。明本農桑通訣目錄的一開頭有一個注文，說明不稱「卷」而

稱「集」的理由，像是出於作者本人之手。可知本書之分集是作者的本意。統計全書的三個組成部分，通訣是六集，農器譜是二十集，穀譜最後的備荒論一節，應當是與佚去的幽七月詩說和食時五觀兩節合屬一集，也就是穀譜的第十一集。合計起來，全書正好是三十七集。這顯然是本書原來的模樣。本來「集」和「卷」二字的含義也並沒有什麼根本差別。本書的明刻本是分「集」的，但後世藏書家著錄還是作若干「卷」。這裏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一談的原因，是本書的分卷上面曾經出現過混亂現象。首先是在編入永樂大典時曾被改分爲八卷，那大約是按照大典一般分卷的篇幅標準來改定的。幸而是原來的分集痕迹仍被保留了下來。試拿庫本來同明本對比一下，各集的首尾基本上是相合的。至於那些淵源於聚珍本的傳本缺少穀譜七、八兩集的標目，那只是偶爾脫漏，在庫本裏面原來是不缺的。有人因此就認爲本書佚文很多，那是誤會。實際上佚去的只是穀譜第十一集的那兩節不關緊要的文字。明本的校訂者大約就是覺得該集的三目已佚其二，所以就僅存的備荒論一目併到第十集之末，從而抹掉了第十一集。這樣一來，本書就成了三十六集或卷了。奇怪的是，庫本的校訂者否定了大典本的八卷分法，同時又明明看到作者的自序，可是却把全書又改分爲二十二卷，提出來的根據是清初藏書家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據說那裏面著錄的本書各部分的卷數是：通訣六，穀譜四，農器譜十二。不過遍查敏求記的各種傳本，都是作通訣六，農器譜二十，穀譜十。而實際上就篇幅來說，穀譜分卷數目不會小於通訣，農器譜的卷數也不應只視通訣加倍。因此可以斷言，庫本的編者是弄錯了。

除此之外，歷來各家書目關於本書的卷數，記載也是很混亂的。明陳氏世善堂藏書目錄作五

卷，清初黃氏千頃堂書目裏面除了農書二十六卷之外，又著錄了通訣和農器譜各二十卷，穀譜十一卷，好像是農書之外，別有這三部獨立的書。後來倪燦編補遼金元藝文志，一方面因襲了黃氏著錄的通訣等三個組成部分的卷數，同時却又依據四庫全書總目把整個農書的卷數改爲二十二。而金門詔的補三史藝文志裏面又獨有農桑通訣二十卷。像這樣紛亂的情況，就更加使得對本書的分卷問題有一加澄清的必要。

作者自序說，本書「爲目二百有七十」。但實際上全書分目無論如何不會是僅僅二百有餘，「二」字顯然是「三」字之誤。據萬國鼎先生的統計，（我國古代農學研究的巨大成就——紀念王禎農書成書六百五十周年，見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三日文匯報）農桑通訣是十九目，農器圖譜二六八目，穀譜八十三目。顯然他是把通訣中畜養篇所包括的八個節合併爲一個目來計算的，另外大約是把農器譜蓀黃門「筴」條所附之「筴」和「籩」、籩條所附之「筴」、蠶繅門「火倉」條所附之「抬爐」、麻苧門「布機」條所附之「毛絕布法」、「鐵勒布法」和「麻鐵黎布法」等段落都算作了獨立的目。依照我們的算法，穀譜仍然是八十三目，但通訣是二十六目，農器譜是三六一目。其實采用任何一種計算方法都是無所不可的，我們只是覺得凡是書中原來帶着「附」字的還是以不作爲獨立的目來計算比較妥當而已。

四、關於插圖

同文字比較起來，古書中的插圖經過傳寫傳刻是更容易走樣的。所以本書原來的圖稿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現在無從得知。不過古代農器的形製比較簡單，不難摹寫，因此可以設想，後世傳本上所

見的，與原稿相差應當不會太大。雖則如此，歷來流行的各種傳本裏面的插圖還是頗有不同之處。庫本提要指摘明刻本說「諸圖尤失其真」，當然是認為永樂大典本的圖才是出於「元時舊本」；但接着又說「今據以繕寫校勘」，這應當理解為也包括插圖在內，換言之，庫本的插圖是照了大典本摹寫，但也經過了「校勘」的。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例如蠶繅篇的繭館圖和先蠶壇圖，校訂者在案語中就是明說了經過「改正分繪」。試拿嘉靖本和庫本的插圖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來以下幾種差異：

- 一、有些圖兩種本子或有或無，相互不同。
- 二、有幾幅圖，明本只畫的農具，庫本則多了背景，因而農具本身就比較小了，甚至不大清楚。
- 三、圖面上有的有字，有的就沒有。
- 四、有些圖的標題，兩種本子也多少有些出入。
- 五、有的圖所表示的對象的形狀有或多或少或少的差別。

但也應當指出，雖然說是有這種種出入，實質上却不存在多大的問題。除了通訣的三事起本和穀譜卷首的插圖以及農器譜最後部分的「法製長生屋」圖等沒有什麼學術上的價值、不關緊要而外，其他的差異主要是繪圖工拙的問題；從農業科技發展的研究的角度來評論，這樣的差別是不太重要的。我們曾把編寫於嘉靖本以後和庫本以前的三才圖會、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古今圖書集成、授時通攷這幾部附有與農事有關的插圖的書都比對了一下，除天工開物之外，各書的這些插圖基本上都淵源於本書。其間比較顯著的差別是在畫筆或雕板的工整程度上面。清代皇家所編寫的圖書集成、授時通攷

和庫本本書的插圖，特別是那些帶有背景和人物的，以及比較複雜的機械，都有些像是「工筆畫」，更有一些簡直近似風景畫了。料想本書的原稿未必是如此。圖書集成的這些圖大都是引自農政全書的，但看得出來一般是經過了改繪，從而畫面顯得精緻。據此推測，庫本的那些圖也未必就是原來永樂大典的忠實的摹繪。畫工加細也許正是當時的「皇家」用來炫耀自己的手段之一。

還有一點需要一提，這就是聚珍本雖然出自庫本，但裏面的插圖往往與庫本相差很大，同時却又不同於明本，顯然是另外繪製的。有的圖是更粗糙了一些，但也有些，特別是農器譜部分田制門的那些圖面，表現了一定的立體感。這雖然說是在繪圖方法上面更進步了，但不免失去了原圖的本來面目，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自然是不足取的。

五、這次的校勘和整理

這次對本書進行校理，希望是盡可能恢復本書的原來面目，以便於讀者、主要是農業科學工作者得以更好地加以利用。前面說到，後世的傳本分別淵源於嘉靖本和庫本，所以也就只能是在這兩種本子中間選擇一個作為底本。就文字方面來說，嘉靖本是很差的，誠有如閩本的校訂者所說的，「其間奪文訛字及語句之顛倒誤衍者，幾於觸目皆是」。例如卷首閩序的頭一句就脫落了兩個字，可謂粗糙之極。反之，庫本的差錯比較起來要少得多。有些地方雖然經過改動，但由校訂者加了案語，交代清楚，如果需要改回，也很容易。只有極少數幾個地方沒有交代，也可以用明本來校正。因此這次的校訂就是用這兩種本子互校，而以庫本為主；另外也參攷了其他各種版本，主要是聚珍本；這是因為它是近世

流傳較廣的幾種本子的根源、比較爲讀者所熟悉的緣故。只有穀譜的第十一集是兩個系統的本子原來都沒有的，這次作爲獨立的一集。所有以上這些訂正，都寫出了「校記」，分附於各目之後。

選擇庫本作爲底本的另一個理由是來自本書三個組成部分的序次方面。農器譜最後的「法製生屋」和「造活字印書法」兩節，是附錄的性質，當然應當安排在全書之末；最末尾作者的那段附白更是如此，所以農器譜應當就是全書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像明本那樣以穀譜爲殿，是違反著書的常例的。

至於插圖，則採用明本的。庫本所根據的大典本雖然就時代來說是在前，但原本已不可復見，庫本的插圖究竟是十八世紀的人摹繪的，而且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肯定是修改過的。反之，明本的圖則確實是十六世紀的作品。我們所着意的，不在於是否畫面更美了一些，或者所表現的器物更完善了一些，而是要盡可能忠實地反映著書時的真實情狀。最早的明本的刊行上距著書時代雖然已在兩個世紀以上，難保完全沒有走樣，但比較起來還是距離最近的，因而即使有些改動，也應當是比較小的。有的圖，明本原闕的，就用庫本的替補；也有的與庫本出入較大，就把庫本的圖附在圖面的一角，或者寫出校記，以備參攷。爲了避免進一步走樣，所有的圖都是就原書原圖攝影製版的。

這樣一來，這次整理出來的這個校本就不是過去的某一個本子的重印，而是一個新的本子。雖然是說，希望它能够比較最接近於本書的原來面目，却也並不是想要在形式上爭取恢復原狀。譬如明本遇到「國家」二字都是提行的，這是元代人的規矩，現在自然用不着依樣排印。有的插圖如通訣的三事